

人類自然的身體性狀是不應被 技術改造的嗎？

Should we Use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the Human Body?

劉月樹

Liu Yue-shu

Abstract

Human beings always try to transcend their limitations. Emerging technologies provide a set of powerful tools that promise to significantly improve human performance, stimulating the desire of some technical experts to transform the human body. Against this backdrop, superhumanism has come into being in today's society and is flourishing. Superhumanism has been criticized by some Chinese scholars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heir criticism of superhumanism is a difficult task that involves multi-level reflection on human nature, technology, and value. I argue that for the issue of

劉月樹，天津中醫藥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中國天津，郵編：301617。

Liu Yue-shu,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ianjin, China, 301617.

《中外醫學哲學》XIX:2 (2021年)：頁 143-14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19:2 (2021), pp. 143-147.

© Copyright 2021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superhumanism,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ontinuing to invoke traditional thought.

通讀王珏老師的文章《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其主旨應當是要回應“人類自然生命技術化的界限何在?”(王珏 2021)這一理論命題。在今天，這一命題的提出已經不再局限於科學的想像，而是日益成為事實性的挑戰。

人類是一種技術化的存在物。技術不僅與人類相伴生，也塑造著人類之所是。人類自然生命的技術化並不是新鮮事物，只不過傳統的技術方式只能對人類施加外部性的影響，也即通過製造工具以彌補人類天然能力的局限，而今天突飛猛進 NBIC 會聚技術已經不限於此，開始將人類的身體性狀作為目的性的工具。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思潮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興起的。

作者指出：“雖然超人類主義與技術息息相關，但根底上支撐超人類主義發展的動力，與其說是來自技術，不如說是來自於人類自我修正的欲望。”(王珏 2021)這顯然抓到了問題的核心。人類是一種被賦予了自由意志但卻有著嚴重自然限定的存在，當人類對此自知並且具備了自我改造能力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激發出自我突破的內在動力。接下來，作者將超人類主義的思想根源歸結於“……是文藝復興和啟蒙精神的直接精神後裔，繼承了前者對人類完善性、理性和能動性的信仰。”(王珏 2021)這一論斷一定程度上忽視了人類思想傳統的複雜性。如果說理性主義主要是現代精神的產物，那麼諸如“人類完善性”和“能動性”的思想觀念顯然要久遠的多，比如傳統世界中所積極追求的善政以及個體的道德修為，其思想傾向是與超人類主義一致的，只是區別於有無現代技術手段的支援。

面對超人類主義思潮及其背後的巨大的技術洪流，本能的反應可能是趨向於保守主義的。然而，一個問題需要超人類主義的反對者回答：“人類‘自然的’身體性狀就是好(善)的嗎?”

或者換一個問法：“人類‘舊有的’自然生命狀態就是好（善）的嗎？”與之相關的問題是：人類改造世界的方式有很多種，我們對其區別化拒絕的理由是什麼呢？是基於深思熟慮，還是道德上的慣性？

下面是一些需要我們思考的更加具體的問題：

首先，什麼是抑制人類技術實現的真實力量？縱觀人類歷史，作為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物，人類總是不斷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只要技術發展到某一地步，人類就會借此拓展到某一地步，我們幾乎看不到作者所擔憂的“在技術完善、風險可控的情況下”人類還會遲疑技術實現的情況。今天的人類沒有一種協調一致的技術行動方式，導致了某種技術即使在某些時空中被限制，也會在另一些時空中實現。抑制技術實現的根本力量可能不是道德，而更應當是技術能力的自洽性和效率價值。儘管這一現實看起來有些殘酷，也不符合倫理學家對世界的想像。

其次，人類對於自我身體性狀進行改造的欲求沒有合理性嗎？我們是寄居在一個完美的世界嗎？人類自然的身體性狀不也是人類痛苦的重要根源嗎？當已有的社會化手段並不能使人類擺脫巨大的生存局限性的時候，依靠新型技術手段加以實現就是不可接受的嗎？

第三，人類改變自身身體性狀的界限是可以先行確定的嗎？如治療性增強與非治療性增強的界限是可以被有效劃定的嗎？實際上，不可能存在一個明確的界限，因為健康和疾病也是人類文化建構的產物，任何的界限都可以隨著認知的改變而變化。

第四，假設某種技術對於人類身體性狀的改變是逐步的，開始是微不足道的不會引起人們的警惕。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大體會接受這種改變。此後，技術又進行了了的一步步的微小推進，直至最終的徹底改變。這種變革方式恰如忒修斯之船，人類應當在哪個界限上開始禁止呢？亦或人類可能始終無法發現這種界限的存在。

我提出上述問題，並不是在支持超人類主義，而是想要說明我們在批駁這一思想的時候，需要更多層次的理論論證。

在文章的後半部分中，王珏老師力圖引入儒家思想來回應超人類主義，並且也為此進行了精緻的理論分析。借助於儒家思想來解讀當代的技術倫理問題，需要我們審慎地考量儒家的人倫道德與今天的技術道德之間的差異性，無論是文中所言的“無形無相的‘中’”，還是“德性之知對聞見之知的優先性”都是如此。技術的道德和人倫的道德不相分離，但也有著宏大和細微的差異。人類對於當代的高新技術倫理問題尚未深入地認知，自然也尚未形成有效的道德思維方式。倫理學者不僅要勇於反思這個世界的合理性，也要審慎對待我們所憑藉思想工具，正如中國著名的方法學學者陳向明教授在《質性研究的基礎：形成紮根理論的程式與方法》一書的序言談到的：“大部分學者習慣於照搬已有學術大師的‘宏大理論’(grand theory) (如韋伯的科層制理論，涂爾幹的自殺論等)，使用邏輯演繹的方法，通過自己的經驗研究對其進行驗證或局部修改。這麼做的結果是導致‘理論資本主義’(theoretical capitalism)的形成，極少數學術大師壟斷了理論的生產，而大部分學者則淪為驗證這些理論的‘無產階級’。”(科賓、施特勞斯 2015)

總而言之，王珏老師的文章對後人類主義問題進行了積極探索，展示了作者的學術自覺和理論勇氣，是值得贊許的。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 珏：〈儒家視角下的超人類主義反思——如何監管我們的後人類未來？〉，《中外醫學哲學》，2021年，第XIX卷，第2期，頁101-128。
 WANG Jue. “A Confucian Reflection on Transhumanism: How to Regulate our Posthuman Futu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Vol. 19, No. 2, 2021, pp. 101-128.
 茱麗葉·科賓、安塞爾姆·施特勞斯，朱光明譯：〈質性研究的基礎：形成紮根理論的程式與方法〉，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5，頁3。
 Juliet Corbin, Anselm Strauss. *Bas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Developing Grounded Theory, translated by Zhu Guangming (Chongq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